

【近代华北历史文化】

# 李大钊关于现代性选择与建构的思想

韩晶晶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现代性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被迫卷入现代性浪潮中。李大钊面对现代性的冲击,经历了从西方文化的追随者到西方文化的反思者再到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角色转换,先后提出了“青春中华”理论、“第三文明”理论、“平民主义”理论,最终探索出一条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中国式现代性的道路。李大钊关于现代性选择与建构的思想映射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光环,为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李大钊;现代性;选择;建构

中图分类号:K26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9X(2017)02-0001-05

DOI:10.13559/j.cnki.hbgd.2017.02.001

现代性是人类社会的潮流性趋势,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开始被迫卷入世界现代性潮流之中。李大钊作为20世纪中国先进分子中的楷模,一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自己的努力。他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直面现代性的冲击与挑战,最终选择用马克思主义来建构现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在近代民族危机下,李大钊关于现代性选择与建构的思想正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缩影。

## 一、李大钊现代性选择与建构的历史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后,历经数千年而巍然独存的古老中国在近代民族危机下风雨飘摇。李大钊在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屡屡受挫,最终选择用马克思主义建构现代中国。

1. 近代中国面临的生存危机为现代性提供了时代契机

鸦片战争后,古老的中国大门在西方船坚炮利的轰击下被迫打开,中国也因此卷入现代性的浪潮中。作为对遭受侵略灾难的本能回应,当时传统士大夫对发轫于西方的现代性思想是排斥的,他们打着民族性的招牌为封建传统制度守灵。随着民族危机一步步加深,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现代性是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潮流,唯有现代性才能挽救国民于水火之中。他们逐渐开始萌生现代化的愿

望,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君主立宪”“建立民国”再到热情讴歌马克思主义,中国人经历了器物、制度、精神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变革。李大钊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经历了从固守传统到向西方学习再到向俄国学习的思想转变,开始了从被动接受现代化思想到主动建构现代化道路的实践进程。近代民族危机使得无数仁人志士探索救国之路,但都以失败告终,在经历多次挫折后才找到了中国式的现代性建构道路,可以说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国情为现代性提供了时代契机。

2. 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性为现代性提供了生存土壤

现代性发轫于西方,它于西方国家而言,是内发型,而于我国而言,却是外发型。中国之所以具备建构现代性的条件,是因为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性为其提供了生存土壤。民族性与现代性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则有融合贯通的可能性。民族性即民族的特性,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有效素质。一般意义上,地域、种族、语言、宗教、历史、文化这些因素被看作民族性的有效构成因子。构成因子的独特性使不同民族衍生出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即这个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兼容并蓄,古代的“民本思想”“大同思想”“理想思辨”思想与西方人文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李大钊正是挖掘了民族性中的现代

收稿日期:2017-02-25

作者简介:韩晶晶(1992-),女,辽宁本溪人,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化因素,才使得民族性与现代性在碰撞的阵痛中得以融合荟萃,最终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 3. 李大钊思想的内在张力为现代性提供了动力源泉

李大钊生活的时代,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特殊时代。他既是旧时代的最后一批秀才,又是实行现代学校制度的第一批新生。既是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儒生,又是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的先行者。他从西方文化的追随者到西方文化的反思者再到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的转变,体现了他思想的内在张力。一方面,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与严峻挑战,李大钊能够与时俱进,从根本上与专制思想决裂;另一方面,李大钊又能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虽有诸多积弊,但传统文化的“有用性”在现代精神的淬砺、洗礼后必然能焕然一新,使民族性焕发时代价值。在他看来,民族性是生成、接受现代性的前提基础;现代性是审视、取舍民族性的价值尺度。民族性因为有了现代性的视野而赋予该民族新的生机,现代性因为有了民族性的解读而成为现实的社会力量,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即“新”与“旧”、“共性”与“个性”相伴相生的关系。正是他思想中这种内在张力为现代性的建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 二、李大钊现代性选择与建构的具体表现

### 1. 李大钊现代性选择之路

李大钊的现代性选择之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从一名西方文化的追随者到西方文化的反思者,最后才成长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选择了用马克思主义建构中国现代性的道路。

(1)西方文化的追随者。近代中国风雨飘摇,千疮百孔。晚清新政破产加深了社会矛盾,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肆意践踏民主,整个中华民族人心向背,“风俗”日趋于敝。而西方物质繁荣政治昌明的景象不禁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心向往之。李大钊也开始反思中国的农业文明、宗法制度,逐渐把目光转向西方世界。在早期著作《论民权之旁落》《民彝与政治》《晨报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都体现了他对西方民主主义坚定的追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青春中华”宣言和“民彝”理论。如果说“青春中华”理论是李大钊从传统走向现代,向西方学习的呐喊,那么“民彝”理论就是他初步探索西方民主政治的成果。正如他在 1916 年的 5 月在《民彝》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民彝与政治》一文中,他把国家民族的政治建构在以民主为内质的“民彝”之上,使民主成为民众之共识,成为一种普遍的要求,“必于其群之精神植一坚固不拔之基,俾群己之权界,确有绝明之域限,不容或紊,测性淪知,习为常轨,初无俟法制之力以守其藩也。厥基维何?简而举之,自由是已”。<sup>①</sup>这振聋发聩的呼声,唤醒了麻痹不仁的中华儿女,更坚定了他对西方自由民主道路的追随。

(2)西方文化的反思者。在探索西方文明的道路中,李大钊愈来愈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李大钊逐渐摒弃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他对西方的态度也从热情学习转为冷静思考。1918 年,李大钊在与朋友的通信中提到“吾辈立言,不察中国今日之情形,不审西洋哲人之时境,甲引丙以驳乙,乙又引丁以驳甲,盲人瞎马,梦中说梦,殊虑犯胡适之先生所谓‘奴性逻辑’之嫌,此为今日立言之大忌。”<sup>②</sup>可见,李大钊先生已经懂得在区分“东西之辩”“古今之辩”基础上,寻求救国道路。同时,在他的著作中,也流露出“调和”的态度,无论是文化上的“调和”还是政治上的“调和”,都主张在法律范围内实现两种力量的抗衡,从而在“对抗”“有容”“调和”的态势下走向“多元”“并立”与“自由”。他在 1914 年发表的一篇政论文章中说:“政本在有容”,“政本在有抗”,“盖衡平之宪法,成于对抗之势力。自两力相抵以维于平衡而外,决不生宪法为物,有之则一势力之宣言,强指为宪法耳。……然则对抗势力之养成,其首务矣”<sup>③</sup>。李氏的这种思想积淀于心,在文化进化法则上同样显示出从一元到多元、自由的思想理路。李大钊从“调和”立场到建立“第三文明”实质上也是他经过对西方文化学习与反思后,逐渐走上向苏俄学习道路的前奏。

(3)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在反思西方文明的过程中,李大钊逐渐认识到,调和的目的实质不是抗衡而是折中,其归宿是并存,还是一种不彻底的温和的改良思想。十月革命使马克思主义学说从理论走向现实,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给积贫积

① 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51 页。

② 李大钊:《强力与自由政治》,《李大钊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98 页。

③ 李大钊:《政治对抗力之养成》,《李大钊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97 页。

弱的古老中国带来了希望,也使李大钊在众多思潮和学说中惊醒,开始转向用马克思主义建构中国现代性,他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多篇文章,揭开了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序幕。“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sup>①</sup>这时李大钊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则是李大钊正式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同年,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一方面深化了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另一方面也表明李大钊已经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组织带领下,邓中夏、张国焘、高君宇等先进青年知识分子组织研究会,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提供平台,也为早期中国共产党成立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干部基础。李大钊不断反思中国的政治出路,最终放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幻想,举起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大旗,从此以后,李大钊开启了用马克思主义构建中国现代性的全新道路。

## 2. 李大钊现代性建构之路

李大钊建构现代中国进程中,先后提出“青春中华”理论、“第三文明”理论、“平民主义”理论,每一个理论都是探索中国式现代性道路重要的里程碑。

(1)“青春中华”理论——现代性建构的宣言书。“青春中华”理论是建构现代性中国的豪迈宣言。清政府新政骗局被国人识破,立宪派对此大失所望,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导致国内军阀混战,有识之士对民主与自由的希冀再次破产。李大钊也逐渐认识到温和的改良政策对于千疮百孔的古老中国而言,已经无济于事,历数千年而巍然独存的中国犹如一艘巨轮,内部结构已经腐朽不堪,外部的修修补补再也无济于事。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不断传入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吸取西方思想的养分,以求挽救中华之良方,导致各种主义、各种思潮被竞相传播,鱼龙混杂的主义导致思想文化标准多元化以及救国方案的多元化。李大钊在对各种主义做出理性识别和冷静分析后,更加坚定了对进化、民主、自由等现代思想的追求,并提出了“青春中华”理论。

“青春中华”理论的主体力量是青年人。青春中华即让衰老颓亡的中华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那么青春中华的缔造者和建设者是谁呢?李大钊在他的著作中已明确指出“青年所以贡其精诚于吾之国家若民族者,不在白发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sup>②</sup>中国的新青年就是改造旧中国,创造青春中国的主力军。此时的李大钊已经不再寄希望于上层统治阶级来挽救国家命运,而是更加强调下层群众的主体性,其思想的背后已经折射出现代性的光环。李大钊认为中国国民的素质和现代国家之间差距较大,国民深受专制余毒的浸染,只有启迪民智,提高国民素养,净化社会环境,才能真正完成社会改造的实践。李大钊认为青年人具有创造精神,“老辈之文明,蔽翳于经验,而青年脑中无所谓经验也”。<sup>③</sup>老一代人思想固化,常与时代妥协,与境遇妥协,而青年人则与时代抗衡,与境遇抗衡,“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sup>④</sup>未来的中国必须实现整个社会的旧邦维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主体性,去回应现代性的冲击,寻找中国式现代性道路,方能使古老中国浴火重生。

“青春中华”理论的实质即拥抱现代性,试图达成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初步融合。李大钊在《晨钟》中,多次提到“白首”与“青年”。用白首形容垂亡之中华,用青年形容待孕之中华。青春与白首不仅仅是时间的推移、季节的更替,更多的是一种“旧”与“新”的对立。青春代表的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弃陈腐之我,迎活泼之我”“弃专制之我,迎立宪之我”的坚决态度,是破旧立新,拥抱现代性的呐喊。正如李大钊所言“有老人而青年者,有青年而老人者。老当益壮者,固在吾人敬服之列,少年颓废者,乃在吾人诟病之伦矣。”<sup>⑤</sup>当西方妄言“我中华之国家,待亡之国家也;中华之民族,衰老之民族也”,李大钊呼吁青年人奋起直追,切勿“荒娱于白发中华,残年风烛之中”无一不体现了他对民族性的坚守,对现代性的热爱。

(2)“第三文明”理论现代性建构的理论支撑。建设新中国必然要有新理论的指导,他在之后的探索中提出“第三文明”理论,即向苏俄文明学习,用第三文明建构中国现代化,为陈腐的中国搭起了通往

①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李大钊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

② 李大钊:《〈晨报〉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李大钊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

③ 同上书,第169页。

④ 同上书,第169页。

⑤ 同上书,第172页。

现代化道路的桥梁。“第三文明”理论的现实载体即苏俄文明。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李大钊随后发表了多篇著作称赞其革命,同时也从十月革命的炮响中汲取苏俄文明的养分,反思东方文明。李大钊认为,俄罗斯地处亚欧交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汇。东方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西方的现代化潮流的融合创造了俄罗斯文明。十月革命则是为新文明、新潮流吹响号角。“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sup>①</sup>他认为十月革命给世界新文明带来曙光,也给旧中国带来希望,把苏俄文明视为构建第三文明的现实模本。

“第三文明”理论的实质即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李大钊认为,东洋文明主静,我国自古以来讲究修身、守静。诸葛亮曾写到“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而西洋文明主动,追求外在的超越,高速的扩张。两种文明各有千秋,“东人之哲学,为求凉哲学;西人之哲学,为求温哲学,求凉者必静,求温者必动”。<sup>②</sup>李大钊在客观比较了东西文明之异同的基础上,又指出了两种文明的缺陷,“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sup>③</sup>东人日常之生活,安于现状,以静为本位,过于保守最终湮没于世界潮流中,而西人之生活,常因利益驱使奔波,野蛮、异化也相伴而生,第三文明吸收借鉴东西文明,取长补短,可以称之为民族性与现代性融合的产物。

(3)“平民主义”理论——现代性建构的实践探索。李大钊喊出了“青春中华”的豪迈宣言,找到了“第三文明”的理论支撑,就开始着手于现代性建构的实践,“平民主义”理论正是用马克思主义建构中国现代性的成果。

李大钊指出平民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普遍潮流,是一种时代精神。既然平民主义是世界性的时代潮流,那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要顺应潮流趋势。他以十年前的清王朝为例,“政尚专制,滥使威权,借口预备立宪,卒无诚意。”<sup>④</sup>民间有德谟克拉西运动,则

清王朝从此衰亡。袁世凯掌握国家实权后,顺应德谟克拉西潮流,赞成共和制,则政权得以巩固,然而假共和的阴谋被识破,臣服于德谟克拉西的假象最终遭到人民唾弃。由专制变成共和,由中央集权变成联邦自治,都是德谟克拉西的功劳。

“平民主义”理论的主体是人民。平民主义一词的语源是由“人民”和“统治”两个词组成,最初译为“人民的统治”或是“民治”。但现代意义上的“平民主义”退去了统治那层含义,他的目的在于人民的自我管理,“治”更多体现在外在治理事物的能力,内在自理的自制力,人人都是治者,人人都非属隶,其间没有难以逾越的阶级鸿沟。“平民主义”理论即在打破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一切阶级特权后,使全体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在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建设属于他们的新国家。

“平民主义”理论的实质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融合。“平民主义”理论是古代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主义思想的结合,也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融合荟萃。李大钊在早期著作中提到的“民彝”思想,把宗彝与民彝相提并论,强调了人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否定了君主的权威。李大钊正是吸收了古代民彝思想中的“重民”因素,又在民主建设实践中融入马克思主义现代民主思想,形成“平民主义”理论。

### 三、李大钊现代性选择与建构的历史贡献

#### 1. 开辟了中国式的现代性道路

李大钊一生担负着民族崛起、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贯穿着这一历史使命的主线便是他反思批判传统与选择建构现代性的探索实践。在思想层面上,李大钊有强烈的现代潮流意识,认为未来的中国一定是现代性的中国,只有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方能使国家复苏、强大。在实践层面上,他从西方的现代性中提炼出其共性因素,同时又从东方文明中萃取现代性因素,将东西方文明融合,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生成之路。他从早期批判袁世凯尊孔复古逆流,极力推崇民主宪政,提出“青春中华”理论和“民彝”理论,到后来信仰马克思主义,追随苏俄文明,提出“第三文明”理论、“平民主义”理

①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② 同上书,第203页。

③ 同上书,第205页。

④ 李大钊:《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在北京中国大学的演讲》,《李大钊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

论,都体现着他对待传统与现代的理性考量,对现代性道路的不断探索。一篇篇文章、一个个理论见证了李大钊如何从一名民主主义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也见证了他面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冲击,如何理性回应,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艰辛历程。

## 2. 映射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光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虽然不是李大钊提出的,但李大钊的思想背后无不折射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其实质也就是李大钊所开辟的用马克思主义建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认为,马克思不是一位反现代文明者,而是一个立志改造现代文明使之成为更高阶段文明的实干家。马克思开出的制度建构的药方,能够根治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顽疾,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超越。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作了坚决的斗争。积极投身于火热的解决中国问题的革命实践中去,自觉地培养出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他也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铺出了

第一条近代中国通往马克思主义预设的现代文明社会的康庄大道。李大钊选择与建构现代性的理论实践探索,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具有重要价值。

## 3. 提供了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宝贵经验

近代以来的中国就是认识、理解、选择、构建、创造现代性中国的历史。现代性中国是李大钊一生都在追求的事业,也是未完成的事业。李大钊所开辟的中国式现代性建构道路,虽然未能实现现代性中国的愿望,但却推动了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为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经验借鉴。当今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暴露了诸多问题,认为现代化就是全盘西化,“资本主义化”等错误观念层出不穷。李大钊在建构现代性中国时,能够兼顾中国的国情,把民族性与时代性互动融合,用兼容并蓄的态度关照民族性与现代性。在中西方的交流、碰撞中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因素,扬弃现代性建构中的不利因子,在民族性与现代性的互动中走出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追随世界潮流的现代化之路,为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多层价值。

# Li Da-zhao's Thoughts on the Se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Modernity

HAN Jing-jing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Abstract:** Modernity i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human society, China was involved in the modern wave after the Opium War. Faced the impact of modernity, Li Da-zhao experienced the transition roles from the follower of the western culture to western culture reflection to a believer of Marxism. He put forward the “Chinese youth” theory, “the third civilization theory” and “populism theory”, finally explored a way to construct Chinese-style modernity with Marxist theory. Li Da-zhao's thoughts on the se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modernity had mapped out the aura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provided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drive.

**Key words:** Li Da-zhao; modernity; selection; construction